钟嵘《诗品》论陶渊明新解*

吴怀东

摘　要：钟嵘《诗品》将陶渊明纳入诗史给予系统解读和正面评价，强调陶渊明“田家”身份、隐逸之士与诗人身份三者的统一，从而发现陶诗特色，肯定陶诗成就，陶渊明从此得以进入诗史。钟嵘的见解深刻，影响深远。“风华清靡”实为两个概念，分指陶渊明之行为与诗歌，却又有联系，兼及其人、其文，“风华”肯定陶渊明言行举止的脱俗，而表现在陶诗内容上正是“清靡”的特点，此论揭示陶诗继承、发扬建安以来诗歌重视抒情、重视形式美的传统而又有自身特点。钟嵘发现陶诗及其特色，实基于其独特的诗歌理念，出于其不合流俗的思想性格。陶诗是文学传统与现实生活共同孕育之结果，钟嵘将陶诗纳入诗歌传统考察，突出陶诗与诗歌传统之互动，而宋代以来恰恰欣赏陶诗与时代之异——对其时代的超越。

关键词：《诗品》；陶渊明；田园诗；风华清靡；诗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2-0100-08

众所周知，陶渊明作为优秀的诗人经历了被发现、被认可的过程，在他从普通的田园隐逸之士转变为优秀诗人的接受、认知过程中，钟嵘《诗品》的评论最为关键。钟嵘《诗品》具有系统的诗学批评体系，知人论世、寻章摘句、推源溯流、品第高下、比较异同、讨论特点，在此理论逻辑指导下，综论陶诗渊源、特点、地位等，大大提升了陶渊明的文学地位，钟嵘对陶诗的认知、判断深刻而准确。学术界对钟嵘论陶的内涵以及诗学思想依据已作深入研究，虽然陶诗“源出于应璩”说、“中品”地位说引起学术界持续的讨论，但钟嵘力图彰显陶诗与主流诗风的内在关联，揭示陶渊明田园诗具有“笃意真古”的独特内涵和“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的自然之美，肯定了陶诗特色与成就，这些观点都得到后代学界充分认可，影响深远。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重新审视、解读钟嵘陶渊明论的主要贡献、内涵与思想依据。

一、首次明确陶渊明的诗人身份及其在诗史谱系中的地位

陶渊明虽然长期隐居于故乡田园，但中间也几次出仕，并且参与了当时重大政治活动。袁行霈说：“陶渊明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开始入桓玄幕，到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冬辞彭泽令，前后八个年头。这正是晋末政局最动荡的八年。陶渊明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出仕，先后入桓玄、刘裕、刘敬宣三人的军幕，置身于政治风云的漩涡之中。”[1]100桓玄试图篡晋而遭到刘裕的镇压，最终刘裕代晋自立，建立了刘宋王朝。陶渊明生前参与了桓玄、刘裕等军阀军幕的政治活动，可见他介入晋末高层政治甚深。

陶渊明不仅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而

收稿日期：2024-10-06
***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魏源《诗比兴笺》校疏”(1202)。
作者简介：吴怀东，男，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合肥　230039)，主要从事“三曹”与魏晋文学、杜甫与唐宋文学研究。

且积极开展文学创作。其《饮酒二十首·序》曰："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2]235《感士不遇赋·序》曰："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2]431在被萧统视为"实录"的《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亦假借五柳先生，云："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2]502陶渊明留下的作品数量，与东晋以及晋宋之际其他作家相比并不少。陶渊明隐居时亦有自己的文友圈子，《移居二首》（其一）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2]130-133《归园田居五首》（其二）云："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2]83不过，陶渊明在江州结交的圈子，显然不同于以京城高门贵族为中心的文学圈子。

和其政治上的活跃度相比，陶渊明与晋末宋初京城主流文学圈子确实没有交流，而主流文学圈子已经告别陶渊明所熟悉的玄言诗传统而开启一种文学新风。几十年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便描述了晋末宋初诗坛主流风气的变化过程："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3]1778-1779谢灵运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3]1743，谢灵运在故乡始宁墅"寻山涉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3]1775，他用诗记述游历，"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3]1754。谢灵运曾亲赴庐山拜谒高僧慧远，和居住在山下的陶渊明擦肩而过，却无交往。陶渊明去世后，当时著名文学家、陶渊明生前好友颜延之，撰《陶征士诔》纪念他，将陶渊明定义为"南岳之幽居者也"，高度赞美陶渊明弃官归隐、不求名利的品格，"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与"[4]。然而，关于陶渊明的学问与文章，颜延之只说"学非称师，文取指达"①，可见评价不高，几乎是无视。事实上，刘义庆组织编写的《世说新语》对陶渊明的失载并非偶然。笔者认为，这正是被视为"田家"身份的陶渊明在高门把持的文化界被忽视的真实写照。可见，陶渊明生前并未进入晋末宋初主流文学圈子，是因为空间和社会身份的限制导致其诗风与当时主流诗风的疏离。

陶渊明去世后，情况出现变化。刘宋中后期鲍照与萧齐时期著名诗人江淹，先后模拟陶诗，后来学者认为这是陶诗被认可的重要标志。其实，鲍照《学陶彭泽体》诗注云："奉和王义兴。"[5]697王义兴即王僧达，曾为义兴太守。王僧达乃权臣王弘之子、临川王刘义庆之婿，高门子弟，宋初著名诗人，被钟嵘《诗品》列入中品。王弘为东晋著名丞相王导之曾孙，在波诡云谲的晋末宋初动荡政局中一直紧紧追随刘裕，而陶渊明亦曾为刘裕幕僚，二人应该早有交往，后王弘为江州刺史，檀道鸾《续晋阳秋》记载王弘送酒给隐居于田园的陶渊明事，可见王弘与陶渊明友善②。也许因为父辈的关系，王僧达才关注陶渊明其人其诗，尽管其拟作不传，但王僧达才是最早注意并模拟陶渊明诗歌的人。鲍照与王僧达曾在刘义庆幕府共事，二人有直接交往。鲍照拟诗云："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尊酒满，朋旧数相过。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瑟当户坐，叹息望天河。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5]697江淹《陶征君潜田居》诗云："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

三益。”[5]1047如果说鲍照的模拟还是受到王僧达的影响，而且鲍照在政坛、诗坛地位远不及江淹在齐梁之际之显赫，那么，江淹将陶渊明列入截止到他那个时代的三十个著名诗人行列而加以模拟，可见陶渊明地位的提升以及对陶渊明诗歌特色的发现。鲍照、江淹都注意到陶渊明的诗歌，但对其特点的理解并不一致。比较这两首模拟之作，虽然都突出了陶渊明隐居田园的生活、感受与创作特点，但鲍照、江淹对陶渊明的解读存在细微的差异：鲍照拟作更接近陶渊明的咏怀诗，而江淹拟作更近于陶渊明的田园诗。众所周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具有诗歌评论的重要意义，他不是简单地模仿某位诗人的某首诗，而是突出被模拟对象的特点，再进行模拟。显然，在江淹看来，田园诗是陶渊明最有代表性的诗歌。我们必须注意到，从事农业劳动的“田家”活动在南朝门阀流行文化氛围中显然是不受欣赏的，因此，描写田园生活的陶诗并未受到肯定。沈约《宋书》虽为陶渊明立传，仍明确将陶渊明视作隐士，表彰陶渊明忠于晋朝的政治品格，“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3]2288-2289，但只是客观地描述了陶渊明隐居田园的特点，和那些隐居于山水的隐士迥然不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刘勰《文心雕龙》、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评论古今文学家，不约而同地都无只言片语论及陶渊明之诗文③，可见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及其表现田园隐居生活的田园诗，不符合当时主流的文化观念和文学观念。从陶渊明生前到钟嵘之前，陶渊明主要是被视作隐居于田园的隐逸之士，他的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几乎被忽视。

钟嵘提出对陶渊明诗歌的正面认识和评价，彻底突破了此前的偏见：

>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6]260

细勘文意，钟嵘这段话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存在内在逻辑上的转折。我们认为，其所针对的就是前述主流或流行的认识：陶渊明是“田家”，其诗风“质直”，是“田家语”。在钟嵘看来，陶渊明虽生活在农村，却不是真正的“田家”，而是一种隐逸行为，其田园诗表达了“笃意真古”的思想和情感，钟嵘因此感慨“每观其文，想其人德”。

何谓“田家”？汉代杨恽《报孙会宗书》云：“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7]应璩《百一诗三首》：“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5]469范云《赠张徐州谡》诗：“田家樵采去，薄暮方来归。”[5]1056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云：“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2]227“田家”就是农民的意思，“田家语”就是农民所说的话、所关心的问题。《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2]85陶渊明的田园诗确实描写了农村的自然环境及其日常起居，但是，在钟嵘看来，陶渊明却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高尚的隐士。隐逸是中古最被推崇的道德风范，“遁世避世，即贤人也”[3]2275，陶渊明几仕几隐，最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主动告别官场而归隐，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与当时隐逸之士的去向相比，陶渊明的隐逸有些特别。陶渊明和周续之、刘遗民被合称为“浔阳三隐”，但沈约《宋书·隐逸·周续之传》载周续之“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3]2280，而陶渊明却躬耕田园。陶渊明所写看起来是农民的生活，难道就是“田家”吗？陶渊明劳动之余，还会友、饮酒、赏乐、读书，《饮酒二十首》（其五）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2]247《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2]106可见，陶渊明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笃意真古”的隐士，他把农村视作自己精神自由的理想天地。因此，在钟嵘看来，陶渊明不是“田家”，陶诗也不是“田家语”，他的诗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表现了其特定的理想和感情——“笃意真古，辞兴婉惬”。一般理解，陶渊明田园诗描写的就是田园生活，“陶诗有很多好处，其中一种便是他对田园生活描写非常真切，无愧田园诗之宗的称

号”[8]。尽管今人这样描述是客观的，但是这种描述只突出了田园，却忽略了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忽略了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独特的立场、态度和感情，忽视了其田园诗中的思想寄托。众所周知，陶渊明田园诗确实表现的是农村生活，但是他是将农村生活作为现实官场的对照而加以描写，寄托了自己追求隐逸的人生理想乃至政治理想，如孙静所论，“陶渊明田园诗的杰出之处和引人之处，就在于它不限于一般隐者的闲情逸志，而时时闪耀着理想的光辉。这种特点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根源就在于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9]。

在公共视野中，陶渊明是江州庐山脚下的“田家”，是隐居于农村的隐士，是描写“田家”生活的不入流诗人，但是，钟嵘不仅确认陶渊明是优秀的诗人，而且将其纳入诗史发展谱系——陶诗“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揭示陶诗继承了优秀的诗歌传统，和主流诗风密切互动，这个判断可谓“前无古人”。钟嵘既强调了陶渊明隐逸的独特身份——“田家”，也突出了陶渊明不同于普通“田家”的身份——隐逸之士，更强调陶渊明“田家”身份、隐逸之士与诗人身份的统一④，并且欣赏陶渊明作为高尚隐士的人生追求，欣赏陶渊明田园诗“笃意真古”的内涵和“文体省静，殆无长语”的自然之美，揭示并肯定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6]260的崇高诗史地位。虽然之前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已将陶渊明纳入诗人行列并对其诗歌进行模拟，但是江淹所做的毕竟只是诗歌创作，而钟嵘在沈约、刘勰、萧子显之后，从理论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对陶渊明五言体的田园诗进行论定，堪称前无古人。尽管钟嵘将陶诗置于中品的做法遭到后代论者普遍诟病，但诚如李剑锋所论：“至于后人指责或迷惑于钟嵘把陶渊明这样一位大诗人放在中品而不放在上品，关键在于他们没有以发展联系的眼光看问题。钟嵘能突破时代局限进而把湮没在众多诗人中的陶渊明‘救’出来，已是极了不起的举动了。”[10]当然，按照儒家价值观，“隐逸”固然高尚，但绝非社会主流，钟嵘未将陶渊明列入上品，主要原因则在于此。钟嵘的评论内容丰富、认识深刻、见解独到，但他从沈约所关注的政治评价转向关注诗歌和文学活动，对陶渊明诗人身份的发现和确认，才是钟嵘最重要的判断和发现，极其难得，值得充分表彰。

二、“风华清靡”说的独特内涵

从《诗品》评论的整体文意看，钟嵘不认为陶诗“质直”，而是“文体省静”；陶诗既有“文体省静”的普遍特点，也有“风华清靡”的一面，“风华清靡”说是钟嵘评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

现有注本大多认为“风华清靡”是一个词语，如曹旭解释为“风韵华美清丽”[6]267；也有学者视之为两个词语，如张怀瑾将“风华”解释为“风采卓绝”，将“清靡”解释为“清新华美”[11]，认为所指皆是诗歌，且内容关联。可是，从当时语言使用习惯看，“风华”与“清靡”应该是虽有关联但语意指向相对独立的两个概念。

“风华”具有独立的含义。《南史·谢晦传》云：“时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尝与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时顿有两玉人也。’”[12]522《南史·到彦之传》云：“溉长八尺，眉目如点，白皙美须髯，举动风华，善于应答。”[12]678可见，“风华”所指应该是人的风采、才华，指优雅的气质、风度。当然，尽管“风华”强调的是外在的可观察的表现，如长相、衣着、谈吐、行为，其实是人内在精神、品质的外在流露，袁行霈如是解释：“‘风华’者，意谓风采才华，指一种内在美的外现。”[1]150

钟嵘“风华”说，显然是赞美陶渊明的隐逸行为，这和时人对陶渊明的总体认识完全一致。在陶渊明生前至沈约撰写《宋书》之前，尽管陶渊明的诗文尚未受到充分关注，但是其隐逸脱俗行为却受到广泛关注和一致赞美。颜延之《陶征士诔》高度赞美其“南岳之隐者”的品格，刘宋时期檀道鸾《续晋阳秋》、何法盛《晋中兴书》中虽未论及陶渊明诗文创作，但也都记载了不少陶渊明特立独行的逸事，沈约《宋书》将其视作隐逸之士而入史传，这些事实充分表明陶渊明的特立独行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几可入《世说新语》。钟嵘“风华”说正揭示了时人所推崇的陶渊明“笃意真古”之隐逸脱俗特点。

“清靡”则指诗歌，来自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清靡”之“靡”应该是“绮靡”之简称。黄侃解释云：“绮，文也。靡，细也，微也。”[13]110现有研究已充分证明，“靡”来自魏晋以来“诗缘情而绮靡”[13]108之思想，代表建安以来诗歌发展追求

抒情、华丽之大趋势。扬雄《方言》云："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曰绫，秦晋曰靡。"郭璞注："靡，细好也。"[14]由细密之好布引申为细腻、细密乃至华丽、美好的意思。《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西晋王衍语云："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15]陆云《与兄平原书》："《祖德颂》无大谏语耳，然靡靡清工，用辞纬泽。"[16]"绮"本来指上等丝绸，后引申为华丽、美好的意思，可以指代美妙音乐、诗文的动人性。陆机自创新词"绮靡"，唐人芮挺章解释云："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17]按照杨合林的分疏，陆机所说"诗缘情而绮靡"，"除了指向诗的形式特征（声色）外，还关联着诗的深层审美特性（缘情之味）"[18]，概括地说，就是强调诗歌要抒发动人的感情（包括男女之情），并且追求形式的华丽美好。

钟嵘认为陶诗具有"靡"的特点，这是十分重要的创见，揭示了陶诗与魏晋以来诗风存在内在呼应的关系。"靡"是陶诗"源出于应璩"的证据，因为钟嵘《诗品》就认为应璩诗句"济济今日所""华靡可讽味焉"[19]59。但是钟嵘对陶诗之"靡"也有限定：既不是"绮靡"，也不是"华靡"，而是"清靡"，钟嵘在沿用"靡"的基础上新创了一个词语"清靡"，以描述陶诗的特点，用"清"来限定"靡"，强调陶诗"靡"而且"清"。"清"本来指水的干净，从汉末的清议、清谈转向清峻，代表着魏晋士人从一种直接关系政治的行为转化为一种清正、超越的人格和审美风范。作为诗歌美学概念，按照蒋寅的解读，其基本内涵是指诗歌语言的"明晰省净"，内容的"超脱尘俗而不委琐"，以及立意与艺术表现方面的"新颖"⑤。陶诗不是"绮靡"，而是"清靡"，即追求抒情、讲究语言形式美而不过分，具有清雅脱俗的格调，诚如袁行霈所说，"'清靡'者，意谓清丽"，"'风华清靡'所强调的是清的一面，与'华靡'所强调的华而又侈不尽相同"[1]150。

从《诗品》文意看，"风华""清靡"应是两个概念，所指称对象与内涵虽有交叉却并不完全一致。"风华"侧重评人，赞美陶渊明隐逸行为的高雅、脱俗，而"清靡"侧重评诗，既指陶诗的语言形式，也指陶诗的内容，而其诗歌内容正是反映了陶渊明隐逸行为之"风华"，包含对陶渊明行为的评论。既往的研究并没有将"风华""清靡"分解为两个概念，只是从诗歌层面上理解其内涵，在笔者看来，这不符合钟嵘的本意。当然，流行的解读往往认为"风华清靡"都指向诗歌，这也不算严重的误读，因为陶诗的魅力并非只来自文字本身，诗句本质上呈现的还是陶渊明的行为与思想。所以，尽管可以笼统地将"风华清靡"理解为赞美陶渊明的为人和为诗之特点，但笔者仍要强调，钟嵘"风华"说主要指向陶渊明主动放弃名利的隐逸脱俗的思想与人生实践，并且这种思想又直接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从而使得其诗歌形成"清"而"靡"的特点。"清靡"说侧重强调陶诗继承、发扬建安以来重视抒情、重视形式美的诗歌传统，而又有自身特点。

钟嵘的评论采用了摘句批评的方法，有的是摘出"佳句"而予以表彰，有的则作为整首诗的诗题而代指该诗。如同张伯伟所论，钟嵘论陶渊明此条"也是用摘句法来驳斥世人'质直'之说，不过，钟嵘虽然看到了'句'在篇中的作用，却并未给予过高的评价。所以，他在实际批评中使用摘句法，就没有将'佳句'特别拈出，视为相对独立的存在而加以叹赏"[20]，钟嵘这里实是通过引用这两句诗指代全诗。那么，这两首诗如何体现"风华""清靡"之特点？

第一句"欢言酌春酒"，出自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2]393

此诗写夏日万物正当盛时，草长莺飞，各适其性，各得其所。诗人再现了自己生活的场景与内容：在宁静的夏日，诗人在劳动之余享受读书、思考的自由，领悟着生活的真谛，体会到生命的意义。这样的生活和格调，就是"风华"的神韵。全诗内容为朴实的写景、叙事，文字朴实而不失华美，正所谓"清靡"。

第二句"日暮天无云"，出自陶渊明《拟古九首》（其七）：

>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华。岂无一时

好，不久当如何？[2]332

此诗写美好的春夜里，天色如水，春风轻盈和畅，“佳人”行乐未竟而东方欲晓。春风、月华、鲜花、美人，这些景象正所谓“绮靡”，但是，诗人却未描写美人的形体，而通过描写她的活动寄托了对美好时光易逝的感慨，流露出深沉的生命悲剧意识，艺术形象优美而感情深沉动人，正所谓“靡”而“清”的“清靡”。

尽管和晋末以来趋向形式美的文学风气不同，但是，两首诗都传达了生命的悲感与乐感，形象与语言优美，极具情致与韵味，也体现着建安以来追求抒情和形式美的大趋势。事实上，《拟古》所模拟的就是汉末无名氏古诗，在《诗品》中被给予最高评价的诗歌就是汉末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9]32，而陶渊明《拟古九首》（其七）正体现了“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特点。

综合来看，陶渊明的文学活动、文化活动也是社会的产物，只不过因为性格、出身、经历、思想信仰、政治集团、活动区域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活动在江州的陶渊明更多地继承了魏晋诗学传统，而未能跟上以京城为活动空间、以高门子弟谢灵运及新晋宠臣颜延之创作为代表的文学新风气⑥。钟嵘的观点影响深远。萧统《陶渊明集序》云：“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19]67“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19]67高度赞美陶渊明其人其诗文。萧统的核心观点之一“辞彩精拔”说，正来自钟嵘“风华清靡”论，而唐代杜甫诗句“焉得思如陶谢手”（《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将陶渊明与被视作时代文学偶像的谢灵运相提并论，他们的认识都是对钟嵘“风华清靡”说的继承与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在钟嵘的评论中，陶诗的“田家语”与“风华清靡”之作是并列的，陶诗的主体风格还是“文体省静，殆无长语”，“风华清靡”不是普遍特点。有学者将“风华清靡”推广至全部陶诗，进行扩大化的解读⑦，显然不符合钟嵘本意。

三、钟嵘论陶的思想基础与思维逻辑

钟嵘对陶渊明其人其诗作出如此精确解读、高度肯定，当然与他的诗学观念乃至性格有关。学术界对其原因较少关注，亦值得一说。

从诗歌理念看，钟嵘具有独到的诗歌标准，这种诗歌标准大致说来比较接近汉魏传统，而与从晋宋之交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南朝以来追求骈俪华美的思潮不同。钟嵘不像刘勰那样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而是强调诗歌要“吟咏情性”，要有动人性——“滋味”，追求“自然英旨”，要求“风力”与“丹采”结合，高度赞美汉末无名氏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赞美曹植之作“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19]37。因此，钟嵘既反对东晋流行的“质木无文”[19]16的玄言诗，也对南朝以来形式主义倾向——“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19]24-25极为反感⑧。陶渊明的人生观就被视作东晋“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21]，与此对应，陶渊明的审美观念并未趋新，而是守旧，保留着与魏晋传统（包括东晋玄言诗）的继承关系，体现着“缘情而绮靡”的传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和陶渊明具有相近、相似的诗学理念，坚守了魏晋诗学传统，因此钟嵘才抛弃原有将陶渊明其人其诗视为“田家”“田家语”的成见，而将“田家”“田家语”与隐逸、陆机以来“诗缘情而绮靡”的创作与诗学传统结合起来，深刻解读陶渊明主动放弃官场名利，不随流俗的品格，揭示陶渊明在诗歌创作上自觉继承汉末、魏晋传统，而与其所身处的晋末宋初诗歌主潮保持距离的史实，从而对陶渊明其人其诗做出肯定性评价。

钟嵘是一位坚守诗学标准和信念的极具个性的学者。历仕宋、齐、梁三朝的江淹是钟嵘的老师，但是在《诗品》中，仅被置于中品。王俭博闻强记，熟谙历代礼仪典故，擅长写作诏策等，史称其“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22]，亦是钟嵘的老师，然钟嵘评曰，“王师文宪⑨，既经国图远，或忽是雕虫”[19]93，竟然将其置于下品。齐梁时代

文艺思想复杂，钟嵘的观念堪称独树一帜。齐梁之际的沈约，寿高而位显，不但擅长写作，诗文辞藻华丽，而且喜奖掖后进，影响极大，在梁代被目为“一代辞宗”[12]1453。《诗品》则曰“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但是，“所著既多，今剪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19]76。唐人李延寿在《南史》中提到，钟嵘在《诗品》完成后曾向沈约求誉而遭拒，钟嵘因此为泄私愤而刻意报复，才将沈约置于中品，并且将他与并世诗人相较，指出“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12]1779。其实，这是后人妄测。钟嵘的诗学思想与当时以沈约为代表的主流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他坚持自身诗学标准，勇于立异。沈约《宋书》只将陶渊明视作人品高洁的隐逸之士，但钟嵘则视之为“隐逸诗人之宗”，与沈约观点不同。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2]76，经历几次短暂的出仕之后果断地退归田园，“种豆南山下”，何尝不是一种勇于立异的精神？不随俗俯仰，“不慕荣利”[2]502，高洁自守，“躬耕自资”[2]607，即使“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2]502，能保持自得其乐的心境，这就是陶渊明精神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钟嵘好评陶渊明其人其诗，不仅出自理论的洞见——他对陶诗的认识确是深刻而准确的，亦是因惺惺相惜，正所谓“了解之同情”。

任何作家，包括杰出的作家、诗学理论家，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他们的创作与文学传统、时代主流都存在或多或少、或密或疏的关联——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这样才构成了作家个性与时代共性的统一，陶诗也不例外。钟嵘论五言诗，关注源流，将陶渊明视作诗人并置于中品，“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着力发掘并推崇的正是陶诗与魏晋以来诗风的内在联系。也正因为钟嵘看到陶诗和晋末宋初以来诗学新风以及自己的诗学理想，乃至主流价值观还不完全一致，所以才未将陶诗置于上品。至于陶诗是不是“源出于应璩”，因为牵涉细微的阅读感受，判断可能不十分准确⑩，但是钟嵘认为作家文学活动都受到文学传统的影响，这个认知思维无疑是深刻的。从根本上看，钟嵘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认识也受到传统的影响，钟嵘的理论也是他所处时代的理论，换言之，陶渊明、钟嵘大致共享相同的诗学思想。众所周知，齐梁文论家中，钟嵘的观点与裴子野的守旧、刘勰的折中、萧纲的趋新等皆有所不同，他坚守魏晋抒情传统⑪。

实际上，对任何作家的认知都是作家作品与接受者合作完成的，接受者具有很强的建构性、主体性。钟嵘对陶渊明的好评，与他所处时代思潮有关，而一旦时过境迁，文化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也必然出现陶渊明其人其诗地位晦显的不断调整。从陶渊明生前被主流文坛忽视，到钟嵘将其定位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6]260，再到与谢灵运齐名，陶渊明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到了宋代，陶渊明的精神品格符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被提高到六朝其他文学家无与伦比之地位，如欧阳修评价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2]477最有代表性的是苏轼的评论：“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2]662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钟嵘力图将陶渊明纳入其所处的诗史谱系，看重突出陶诗与他所处时代诗风之同，而宋人欣赏的恰恰是陶诗与其所处时代文化之异——陶渊明对他所处时代的超越。当然，尽管钟嵘的“风华清靡”说不同于宋人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说⑫，但后者显然受到前者的启发。

钟嵘《诗品》的陶渊明评论虽然文字不多，但内涵丰富，显示出钟嵘独到而深刻的诗学眼光，在陶渊明接受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学界讨论甚多，但是也还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讨论这些问题，既关乎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理解与认知，也关乎对钟嵘及其《诗品》乃至六朝文学思想复杂性的准确认识。

注释

①“文取指达”说重点指向陶诗与玄言诗的复杂关系，当然，也承认陶诗具有孔子所谓“旨达而已”——语言质朴的特点，后一种内涵表明颜延之对陶诗评价不高。参见吴怀东：《“文取指达”说的千古误解及其思想背景》，《江海学刊》2022年第2期。②有研究者认为王弘任江州刺史时与陶渊明没有交往。此论尚需进一步论证，本文仍从旧说。参见钟书林：《陶渊明与王弘交游文献辨考》，《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③沈约《宋书·陶潜传》引用了陶渊明多篇文章作为史料证据，却竟无一字评论。④对陶渊明而言，如果

不是因其诗文创作，他就沦为一名普通的隐士，也不可能被后世所了解并高度赞美。参见蒋寅：《陶渊明隐逸的精神史意义》，《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但有学者认为陶渊明事实上并不高尚，其诗文创作中的表达只是一种“作秀”，此说未免厚误古人。⑤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⑥吴怀东：《颜延之诗歌与一段被忽略的诗潮》，《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⑦杨立群关注到钟嵘这种认识的独特性，认为钟嵘此说正是后来苏轼所谓“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思想之源头。此说可商。参见杨立群：《论陶诗的“风华清靡”》，《江淮论坛》2007年第3期。⑧关于钟嵘的诗学思想，《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二编第四章有论述，参见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⑨按，王俭卒后谥“文宪”。⑩袁行霈：《钟嵘〈诗品〉陶诗源出应璩说辨析》，载《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⑪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中华文史论丛》第八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⑫关于苏轼此说的内涵及其解读理论逻辑，参见吴怀东：《苏轼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思想发微》，《人文杂志》202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王质.陶渊明年谱[M].许逸民，校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127.

[5]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钟嵘.诗品集注[M].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96.

[8]刘奕.诚与真：陶渊明考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383.

[9]孙静.谈陶渊明田园诗的浪漫主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4）：59.

[10]李剑锋.陶渊明接受通史[M].济南：齐鲁书社，2020：77.

[11]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300-301.

[12]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陆机.文赋集释[M].张少康，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4]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716.

[15]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46.

[16]陆云.陆士龙文集校注[M].刘运好，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881.

[17]陆机.陆士衡文集校注[M].刘运好，校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15.

[18]杨合林.陶渊明三论[M].长沙：岳麓书社，2002：148.

[19]钟嵘.诗品译注[M].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

[20]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96.

[2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272.

[22]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38.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ao Yuanming in Zhong Rong's *Shipin*

Wu Huaidong

Abstract: Zhong Rong's *Shipin*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s and positively evaluates Tao Yuanming by integrating his identity as a farmer, recluse and poet, thereby unveiling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ao's poetry and affirming his achievements. Since then, Tao Yuanming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history of poetry. This perspective is profound and has exerted a lasting influence. "Elegant and Charming" (Fenghua Qingmi) encompasses two interconnected concepts, that reflect Tao Yuanming's behavior and poetry, covering both the person and the work. "Elegant" affirms Tao Yuanming's refined and unconventional conduct, while "charming"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oetry in terms of content. This theory reveals that Tao's poetry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tradition of emphasizing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formal beauty in poetry since the Jian'an period, while also possessing its own unique features. Zhong Rong's insights into Tao's poetr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rooted in his distinctive poetic philosophy and his unconventional personality. Tao's poetry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ry tradition and real life. Zhong Rong examines Tao's poetry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poetic tradition, highligh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o's poetry and the poetic tradition. Since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have appreciated Tao's poetry specifically for its divergence from the times—its ability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s of its era.

Key words: *Shipin*; Tao Yuanming; pastoral poetry; Fenghua Qingmi; history of poetry

［责任编辑/周　舟］